河南文物考古研究丛书



蔡全法考古文集

蔡全法 著

科学出版社



1967年在孟津白鹤留影



1968年在孟津白鹤与同村青年合影（右一为作者）



1973年3月与王与刚、杨国庆在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拓画像石拓片（前为作者）



1973年密县打虎亭汉墓石刻拓片与壁画临摹工作人员合影（中排右二为作者）



1975年与女儿蔡红在河南省博物馆门前合影



1979年在登封少林寺千佛殿临摹壁画



1980年夏在少林寺外留影



1982年秋在柘城汉墓发掘



1983年全家在新郑工作站合影



1987年全家在湖南长岭合影



1987年在郑韩故城与本所领导、职工合影
（右一为作者）



1988年在省文物钻探培训班讲课



1993年在新郑金城路马坑进行清理工作
（后排右一为作者）



1993年在新郑金城路3号祭祀坑工作



1993年为新郑金城路出土编钟测音
（右为作者）



1994年8月14日在延吉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与会专家程贞一先生合影（左为作者）



1994年12月在新郑周庄墓地查看车马坑清理（后排右二为作者）



1995年与安金槐先生在新郑王行庄韩王陵合影（右为作者）



1997年冬向国家文物局黄景略、省文物局杨焕成等领导与专家介绍郑国祭祀遗址（中间左一为作者）



1997年在新郑中行祭祀遗址发掘工地摄影



1997年在新郑中行祭祀遗址清理编钟（后为作者）



1998年向安金槐先生介绍古城寨发现情况（左一为作者）



1998年1月23日与李伯谦、宋国定教授在古城寨工地（右四为作者）



1998年4月18日陪同安金槐、许顺湛先生在古城寨工地指导发掘（右三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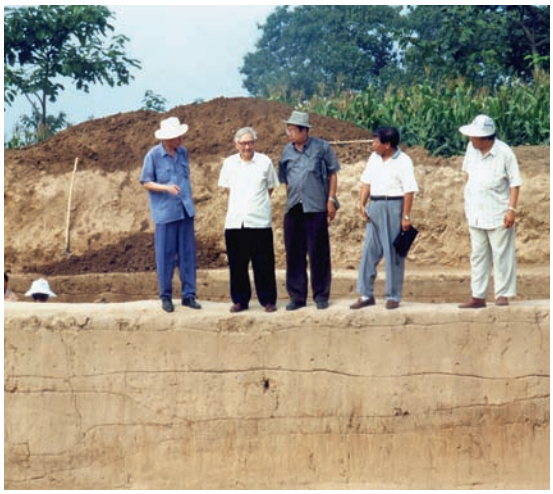
1999年陪同安志敏先生看古城寨陶片标本（左二为作者）



1999年向殷玮璋、仇士华等专家介绍古城寨发掘情况（左一为作者）



1999年向俞伟超、张居中、宋国定教授介绍古城寨城墙夯筑情况（左一为作者）



1999年与严文明、娄玉栋等先生在古城寨工地（右二为作者）



1999年在新郑工作站与安志敏先生合影（右为作者）



1999年在新郑工作站与董琦博士合影
（右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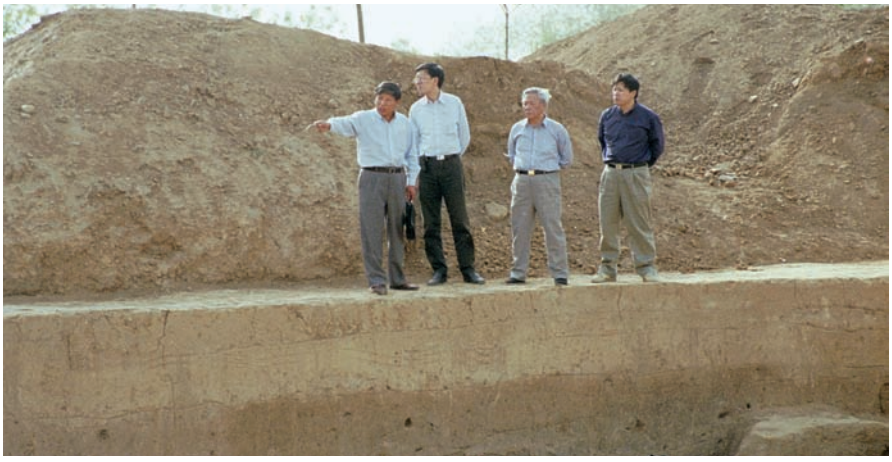
1999年陪同张忠培、张文军等先生查看
古城寨陶器标本（左一为作者）



2000年在古城寨与郭大顺等专家合影
（左一为作者）



2002年在古城寨与俞伟超、张居中等教授
合影（左二为作者）



2003年在古城寨发掘工地向张忠培等专家介绍发掘情况
（左一为作者）



2003年在新密古城寨工地（左为作者）



2004年与周昆叔先生、杨瑞霞女士在平顶山蒲城店做古环境调查（中为作者）



2011年在新郑戴湾故城进行调查工作（前为作者）



2011年在新郑工作站进行整理工作（左为作者）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丛书

蔡全法考古文集

蔡全法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论文集共收录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约四十年间的学术论文37篇，内容涉及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亦包括黄帝文化、中原古城古国古环境、郑韩故城出土陶文字与量器、东周冶金铸造技术、青铜礼乐器与青铜镜。古代美术方面，从史前岩画到佛教造像，从帛画艺术到汉墓壁画、石刻线画艺术，都有涉猎。古陶瓷方面，包括陶器烧造技术，北方白瓷起源，早期青花，以及汝窑与耀州窑、北宋与南宋官窑之关系，南方的德化窑等。各方面的学术探讨，多是依据考古新发现。有的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不同看法，进一步加深认识，还有的是另辟蹊径，创见性地填补学术空白与欠缺。各文都能论据确凿，不尚空谈，不做无谓的发挥。

本论文集可供历史、考古等领域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全法考古文集 / 蔡全法著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6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34303-1

Ⅰ. ①蔡… Ⅱ. ①蔡… Ⅲ. ①考古学 – 中国 – 文集 Ⅳ. ①K870. 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4891 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范雯静 / 责任校对：林青梅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 sciencep. 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1/4 插页：4
字数：535 000

定价：138.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考古四十年回眸

方今中国，日新月异，诚可谓千百年来未有之气象。适逢盛世又迎来本所 60 年庆典，按中国文化传统，60 年一甲子，一轮回，由此便知其不易。从国家到单位都有过艰难的创业起步，也经历了昔日的奋斗与辉煌，作为单位的一员，曾与之共枯荣 40 载，追今怃惜，不免思绪万千，心潮起伏。

参加工作那年，正值“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在文博事业迫临青黄不接的形势下，经上级批准，河南省博物馆到洛阳招工 16 名，其中分配给孟津县 5 个名额，我占其一，从此辞别教书育人的忙碌，走上了文博工作岗位。“文革”中省文物工作队与省博物馆合并，单位虽有文物工作与博物馆业务之分，但人员还是统一调配使用。据说是我字写得比较好，抽我去保管部填写器物卡片，具体工作都由李淑珍老师安排。此间闲暇，也翻阅书籍，或进展室看看各时期文物的特征。印象中，展室就是我工作后的第一课堂。大约一个多月光景，赵新来老师在仓库指着一件青铜鼎问我：“小蔡，你看看这件东西是啥时代的?”我先是一惊，然后胆怯地答道：“西周的对不对?”赵老师既高兴又惊讶地说：“你可以呀，来个把月竟然能认对时代。”这次考核虽属偶然，但终生难忘。看来，干啥得懂啥，千万不能懈怠。否则，何以立足。从那天起至今，我摒弃杂书，注重业务，已成为日常持而不变的准则。

1973 年 3 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单位抽我和杨国庆跟着王与刚老师去密县打虎亭给汉墓石刻画像拓片，在打虎亭他给我们讲了拓片的浸纸、研墨、贴纸和砸纸、上墨等方法，并一一示范。没多久，王老师因闹肚子回郑州看病，就把工作委托给我，又找了民工，我们三个人日夜兼程，白天一天，晚上都是干到 11 点钟方回驻地休息。连续 3 个月，虽然辛苦，却练出了打拓片的好功夫，以后无论在什么气候条件，什么地点，都能够打出高质量的拓片。后来，河南去日本展览的部分拓本，国家文物局赠送外国友人的河南著名石刻拓片，以及馆藏的名人碑刻拓本，不少都是出自我手。

到 6 月，我们已将打虎亭 1、2 号墓中的所有石刻拓完。这时正逢单位招集美工来打虎亭临摹壁画，由于本人在学校教书时，经常办板报，画的巨幅水粉宣传画也都是临摹的，所以单位同意我也参加临摹工作。参加临摹人员有中央美院专门从事临摹教学的王定理先生，本馆的刘建州、张家太老师，及本馆美工组的邓邦镇、卢波、毛本华、侯小红，还有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文革旺、石磐石、井庆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美工余痒等。这些人中，除王定理、刘建州、张家太之外，全部都是毕业于中央美院或中央工艺美院。他们个个工作认真，尤其重视业务水平的习练与提高。在临摹壁画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受到王定理先生与其他同事们的具体指导，在工作之余，跟着这班美术方面的高手夜里画素描，早晨上班前到外边写生。这些基础训练成为我终生不再有过的机

遇，谁都不曾想到，大家竟然将打虎亭一个村子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挨个画了一遍，后来还跑到外村找人画素描。这些美术积淀和水平的提高，成为我终生索用不尽的宝贵财富，也成为田野考古工作中壁画临摹、田野绘图、室内绘图，甚至古代艺术研究等方面的基础。1979 年，我被抽去参加少林寺千佛殿整修工程，主要作千佛殿壁画的临摹和东壁壁画的揭取与复原工作。工作分三步走，第一阶段是对千佛殿内 300 平方米的壁画进行临摹；第二阶段是对壁画的保护和对东壁壁画的揭取；第三阶段是对东壁壁画进行修复和复原。临摹工作由苏思义负责，其他还抽调了一些地市文化馆的美术创作人员。工作开展月余，苏思义脚腿水肿回郑州，有的人因爱人生病，回家照顾。抽调的美工都没搞过古代壁画的临摹，不懂临摹的基本要求以及壁画的作旧方法，一时组织工作和指导临摹就都落在了我的肩上。虽然异常忙碌，但临摹工作结束，仍属我临摹的最多，约占壁画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年终并受到河南省少林寺整修办公室的嘉奖。如果没有 1973 年打虎亭汉墓壁画的临摹与绘画锻炼，干好这一工作是不可能的。后来又参加了陈进良老师负责的壁画复原工作，我们从壁画后背的化学加固、上墙复原，到最后壁画的接缝和补绘等，都一一顺利完成。壁画工作结束后，还与苏思义、刘建州共同与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了《少林寺千佛殿壁画》一书。

在少林寺工作之余，还针对少林寺现存宋蔡京书写的《面壁之塔》塔铭，与丢弃在初祖附近乱砖块堆上的残破石函，写了《少林寺北宋舍利石函艺术试析》一文。调查考证了北宋面壁塔的位置、年代，还对石函线刻佛教绘画内容艺术风格等进行了研究，填补了少林史志中的缺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受沁阳文管会的委托，对沁阳一座北朝墓及其石棺床的线刻画进行研究，写了《沁阳向粮北朝墓及画像石棺艺术》，这是参加工作以来，学习掌握佛教石刻知识和佛教艺术的成果之一。

从 1974 年开始还断续搞了 4 年革命文物，工作以吕品老师为负责人，成员有黄崇岳、段铁安和我。我先后完成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路过桐柏山区的情况的调查，并征集了与之有关的馍篓与水桶两件革命文物，撰写了《鱼水深情——记馍篓水桶两件革命文物》一文，发表于 1977 年《河南文博通讯》。之后又对周恩来总理视察河南偃师、洛阳的事迹进行了调查，并征集了大批文物。接着又对民族英雄吉鸿昌的事迹进行调查，在天津征集了吉鸿昌留下的清代瓷瓶，撰写了吉鸿昌革命事迹调查文字资料，并收集了大量图片资料，在吕品老师的带领下，到吉鸿昌的家乡扶沟县筹办了“吉鸿昌烈士英雄事迹”展览。我还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为正在准备拍摄的“吉鸿昌”电影提供资料。后又相继调查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豫北火龙岗战役等，调查情况多有文章发表。前后约 4 年时间的调查，跑遍了全省各地，编写各种调查资料数十万字。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种革命史迹和英雄人物身上，不仅认识到革命成功之不易，也深受其革命精神的感染，这成为我一生工作中的鞭策与动力。

1976 年为加强夏文化探索与研究，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作，调查发掘传说中的禹都阳城——登封王城岗遗址。单位为保证这一课题的进行，由安金槐队长挂帅，抽调本所郑杰祥、刘式今、李京华、曹桂

岑等五位业务骨干和十余名青年人参加该项发掘。为了保证发掘资料质量的规范统一，发掘前在登封告成对这班青年人进行了培训。还规定了无生老病死，一年内不准请假，要长期坚守在工地等。所有田野资料限时整理完成后，先经郑杰祥或李京华验收，过关后再由安金槐审核，不合格者重新整理。我记得发掘结束时，每个人从洗、对陶片到绘器物草图、写发掘小结都要独立完成。我的资料提前一周完成，验收都是免检通过，交完资料还帮助安先生画了一张东周阳城彩色平面图。此图是用于即将召开的夏文化学术讨论会。本次发掘的重大发现之一，是在王城岗东部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堡遗址，并为世人和学界所重视，但其另一重要收获却很少为人所注意，即王城岗的发掘培训多是年轻人，熟练掌握了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及有关的业务知识，先后两批年轻人中，有不少人成为本所的业务骨干，还有一批人后来都走上了厅、局单位的领导岗位，改变了“文革”带来的业务人员青黄不接的现状。这对后来本所的发展以及河南文物考古事业的进步，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82 年我被抽调去新郑工作站发掘。去后曾赴湖南长沙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中国古代史培训班。1983 年又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郑州举办的全国文物干部培训班，这些培训使我收获良多。1984 年单位调李得保回郑州整理编写《郑韩故城》报告。从此时起直到 2000 年，由我主持新郑工作站的发掘工作。根据当时工作站的业务现状，我首先招聘培养技术人员，给他们补习文化课，进行业务辅导，规范田野钻探与发掘清理工作的程序、技术要领与标准要求，田野发掘纪录、室内外绘图的方法，以及陶器、青铜器的修复等，样样都从头做起，进行了定人培训。与此同时，规范完善文物资料钻探、审报手续，并帮助新郑县文物干部（原来仅薛文灿一人）筹建新郑文物保管所，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加强文物保护与管理，促使新郑的文物工作走上正规、有序的道路。省、县两级文物单位相互配合，密切合作，也改善了省文物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营造了前所未有的文物保护工作氛围。我们在配合基建钻探发掘的同时，对于郑韩故城长期空缺的重大学术课题加以关注。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郑韩两国的故都，春秋时期的郑国大、中、小型及战国时期的韩国中、小型墓葬都有较多的发现，唯独韩国侯王陵墓成为缺环。我们在郑韩故城周围也曾发现一些存在于地面的大冢，因原来工作站的一些业务人员认为是汉墓，加以否决，而未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1985 年的一天，据辛店文化站反映，辛店乡许岗村东有一很大的夯土台子，不知道是不是古代的房基。我与县文管所薛文灿所长一同去调查，在许岗村东确有一约 8 米高的夯土台基，其北面是由东向西通往村中的路沟，南北两侧断崖上露出四处南北相对应的凹形五花土断面，土层都经夯打，夯层历历在目。从截断的剖面看，南侧夯土位置略低，北面略高，如果将其连接复原，很显然就是斜坡墓道。在陵区周围踏查，我们在夯土台基西侧不远处发现了墓室中的夯土，在台基东侧土坑中，也发现了夯土层，并且都与墓道相照应。捡到不少战国陶片。按现象推测，这里应该是有东西一线排列，南北有双墓道的大型战国墓群。后来继续探查，确认是 4 座有南北双墓道的大型战国墓，还在其墓道以北查出 4 座附葬坑。以此为契机，我们安排了数批钻探人员对郑韩故城周边的大型陵墓作全面调

查，共发现许岗、冢岗、苗庄、暴庄、胡庄、宋庄、冯庄、王行庄、柳庄、渔夫冢等11个陵区，近30座大型陵墓和众多的附葬坑，解决了韩侯王陵墓的分布及侯王墓与夫人墓的排列规律、墓葬形制与规模、陵寝建筑、附葬习俗等相关问题，弥补了数十年无韩侯王陵墓的空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大规模的基建项目与日俱增，这给一座两千多年前的故城的发掘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发现机遇。在我主持工作的20年的时间内，新郑工作站发掘古墓葬千余座之多，车马附葬坑及殉马坑100余座，遗址数十万平方米，对郑韩故城城址布局、城墙修筑年代、宫殿、宗庙、社祭遗址、制骨、制陶、铸铜、铸铁、仓廪、道路、韩国量器、陶文字等都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性进展。

为了更好地做好发掘工作，新郑工作站还加强了钻探技术经验的总结与培训。避免或尽量减少在钻探中遗漏文化遗迹，为发掘提供较为准确的资料依据。通过对钻探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编撰了钻探技术讲义，后来成为河南省文物考古钻探培训班的主要讲义之一。并分期多次在省文物考古钻探培训班上讲解文物考古钻探知识。还先后到三门峡、洛阳、许昌、南阳、新乡、商丘、平顶山、郑州等地市学习班上讲钻探技术知识，受到钻探技术人员的较好评价，也为提高河南省考古钻探技术水平奉献了绵薄之力。后来将这些讲义又编撰成《考古钻探知识与技术》一书，成为当时北京文物、考古书店的畅销书之一。

通过对郑韩故城城墙的发掘，了解到郑城城墙的修筑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也使郑韩故城的修建时间问题得以解决。郑城初建于春秋初，是先从北墙、东墙北段和南墙开始。到春秋晚期仍在修筑东墙临黄水河（溱水）段落。此时，在城内（今后屯市化肥厂西至后端湾村西南）另筑了东西隔墙，将城一分为二。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将国都由阳翟迁郑，开始大兴土木，将郑城加宽加高，还在北墙上修筑了4个马面，并舍弃双洎河以南的南城墙，在东城南部的双洎河北岸修筑了小城墙。这使我们对郑韩故城城墙修筑的起止时间以及建筑方法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通过对郑韩故城内外大型墓地的发掘，认识到郑国高级贵族墓地多分布在城内的今城关镇南街、后端湾、仓城西、新郑国税局、张龙庄东等地。而韩国侯王陵墓都分布在郑城以外的新村镇、辛店镇、梨河镇、关音寺镇等地。郑城周围的李马、烈江坡、蔡庄、周庄等墓地则主要是郑和韩国中小贵族及平民墓地。长期的多项发掘基本解决了郑、韩两国高级贵族的墓葬形制、棺椁葬制及附葬车马坑配置规格等学术问题，发掘的千余座东周中小型墓葬，为解决郑韩故城东周陶器墓的分期及丧葬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内城中战国小城的发掘，对该城性质有了新认识。这里当是韩国宗庙基址，也是目前已知郑城最大的战国建筑基址。城中心发现的韩国宗庙碑，是目前我国最早的石碑。此发现对研究韩宗庙形制、庙碑所立位置与碑刻起源，战国时期郑城坐落方位的变化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内城今郑韩路的发掘，特别是战国宫城西墙、城门缺口、道路、大型排水管道与设施的发现，使我们改变了数十年来以为的原来的夯筑小城（面积：320 米 ×500 米）是韩宫城的认识，也对郑城布局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城宫城城墙以西发现的战国缫丝纺织手工业作坊遗存，是国内保存状况最好，年代最早，十分罕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

通过对新郑热电厂大型制陶作坊的发掘，发现 20 余座不同时期的陶窑，基本解决了郑城从春秋初期到战国晚期烧陶技术及窑形发展演变规律等重要课题。中国银行新郑支行基建地春秋战国铸铜、铸铁遗存的发现，对于解决春秋时期青铜礼乐器铸造，钱币铸造与制范技术，战国铸铁生产工具、条材，兵器的制造，韩国钱币铸造以及仿铸魏、赵两国钱币，铜、铁生产工具铸造，制范、烘范等多项技术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是中国银行新郑支行郑国祭祀遗址的发现，出土的青铜礼乐器不仅数量惊人，且保存完好，非常精美。所以在发掘期间，就已入选 1997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经研究认为是周代罕见的社稷祭祀遗存，其对于研究郑国社祀制度、规模与文化内涵等都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该遗址的发掘同时也解决了郑韩故城的陶器分期问题。

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也是 1997 年至 2003 年在本人主持下发现并发掘的。该城是我省乃至国内唯一一座地面保存相对完整又有高大城墙的龙山晚期城址，面积 165000 平方米。更为重要的是，在该城东北部发现了龙山晚期宫殿、廊庑夯筑基址，成为早于二里头文化，而与之又有共性，并在夏纪年之内的物质文化载体。此发现为二里头 1、2 号宫殿基址找到了源头，也进一步证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由于地上地下城墙保存状况较好，在发掘过程中，还解决了龙山时代墙体夯筑技术问题。其以小块版筑为主，又有分段分层填筑夯打和护坡堆夯等方法，在中国夯土建筑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该城具有非同寻常的考古学术价值，2000 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2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国家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科研项目。

40 年一路走来，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发掘的忙碌，研究的艰辛，虽无辉煌业绩，但成就了我这个田野考古普通一兵，为国家文物考古事业奉献微薄之力的念想。数十年来，从一名工人转干，到国家文物局的特批考古领队，再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郑韩故城考古领队到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再到业务科科长，大半生中所承担的各项工作都是尽力而行，主持或参与的考古项目，都坚持田野一线，注重科学发掘，课题或深或浅研究，都恪守不尚空谈，不做无谓的发挥。曾先后发表论文、简报等各种文章 160 余篇，主编《考古钻探知识与技术》、《新郑郑国祭祀遗址》著作两部，与同仁合编《河南出土壁画》图录一部，也是《河南考古四十年》、《启封中原文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 续河南、江西卷》三著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研究领域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古城、古国到夏商周三代文化，甚至汉、南北朝、唐、宋文化；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物的调查征集；从史前岩画调查研究到古文字，再到古代石刻、壁画、帛画及其他绘画研究；从陶瓷器烧造技术，到不同

窑口瓷器研究；从青铜礼乐器研究到青铜镜研究；从东周铸铜、铸铁技术研究再到战国铸币技术研究等，都有涉及研究成果中，《近年来新郑“郑韩故城”出土陶文简释》曾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进步三等奖。本人参与合作完成的少林寺千佛殿壁画揭取复原技术，获得河南省文化厅科学进步三等奖和国家文化部科学进步四等奖。《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一书，2006 年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进步二等奖。1995 年 2 月荣获河南省文化厅直属单位“十佳职工”称号，同年 5 月，再获中共河南省直工委和省人事厅授予的省直工委“十佳职工”称号。2000 年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奖。2002 年被推选为河南省九届政协委员，2005 年又被河南省政府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07 年被新郑黄帝故里研究会和新郑市政府授予黄帝故里终身贡献奖，2010 年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授予炎黄文化研究杰出贡献奖。这些荣誉与本所历届领导的关怀，同仁们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借此机会，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悠悠岁月，实是弹指一挥间，不觉已进入“老骥伏枥”之年，虽无千里之志，但仍能发挥余热。近年承担着《郑韩故城》近 40 年发掘报告的整理、研究与编写。真诚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单位及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再添砖增瓦。

蔡全法

2011 年 7 月 11 日于新郑

目　　录

考古四十年回眸…… (i)

古城古国古环境篇

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探析 …… (1)
颛顼时代传承脉络与氏族文化关系 …… (10)
炎黄文化定位及其黄帝故都问题商榷 …… (20)
炎黄文化研究若干问题之管见 …… (31)
从西平董桥遗址看西陵氏族之兴起 …… (38)
古城寨龙山城址与中原文明的形成 …… (46)
新密古城寨城址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地位 …… (54)
“黄台”、“黄水”与“启都”新论 …… (63)
夏早期都邑“阳城”与“阳翟”探索 …… (72)
商都郑州之根源 …… (81)
邘国、邘水、邘都析议 …… (91)
奠及其都邑考 …… (98)
40 余年来郑韩故城考古重要收获 …… (106)
试论韩与楚文化的关系 …… (119)

古 文 字 篇

近年来新郑“郑韩故城”出土陶文简释 …… (127)
郑国祭祀遗址出土韩国陶量及其文字研究 …… (145)

青 铜 器 篇

新郑李家楼青铜器钩沉 …… (157)
楚郑两国编钟的比较与研究 …… (169)
郑国祭祀遗址及青铜礼器研究 …… (178)
郑国编钟与郑声研究 …… (185)
新郑铜镜试论 …… (196)

石刻、绘画篇

中原文明的神奇画卷
——具茨山岩画探秘 …… (210)
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及其相关问题 …… (217)
试论楚国人物龙凤帛画的艺术成就 …… (224)
洛阳西汉墓壁画艺术源流与美学风格 …… (232)
沁阳北朝石棺床艺术考略 …… (242)
荆浩山水画《匡庐图》赏析 …… (252)
冯京墓志考释 …… (256)
少林寺北宋舍利石函艺术试析
——兼谈函题记与面壁塔诸问题 …… (265)

冶金铸造篇

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钱范、有关遗迹及反映的铸钱工艺 …… (273)
郑晋两国铸造技术对比研究 …… (282)

陶　瓷　篇

河南龙山文化陶器烧造技术概览 …… (292)
从巩义白河窑看我国北方白瓷的起源 …… (306)
早期青花瓷及其若干问题 …… (319)
汝、耀两窑关系试析 …… (326)
汝瓷源流与宋南北官窑之关系 …… (337)
德化窑的始烧、发展与昌盛 …… (344)

附录 …… (354)
蔡全法先生著作存目 …… (354)

编后记 …… (361)

古城古国古环境篇

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探析

裴李岗文化自1977年在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西发现以来，30年间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其主要成就是对聚落分布区域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甚至有些发现是填补了区域的空白。特别是数十年来对早于裴李岗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确认，以及仰韶文化早期地层叠压，裴李岗文化晚期遗存关系的发现，使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编年体系，从而可以把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研究置于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之中，尤其是数十年来对裴李岗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与研究，揭示了裴李岗文化聚落的不同类型，以及各种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对聚落形态的影响。根据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学界基本把裴李岗文化置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晚段。所以就聚落形态和文化传承因素而言，裴李岗文化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面我们将按这一时间和空间框架，探索研究裴李岗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生和发展。

一、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溯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裴李岗文化的遗物已有零星发现[1]，当时人们都将其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未能认识到是一种新型文化而引起重视。1977年春，原开封地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对裴李岗遗址进行了试掘，开始认识到“裴李岗遗址所出的浅腹碗形鼎、筒形罐、鞋底形石磨盘、长条形石磨棒、两端均有圆弧刃的石铲，在仰韶文化诸类型中都没有出现”过，其具有独立的文化特征，应是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并将这种文化初步称作“裴李岗类型”文化[2]，随即又定名为“裴李岗文化”[3]。^{14}C测定证明，这种文化早于仰韶文化早期，因此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上的一段空白，也是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数十年来，裴李岗遗址已发现了150多处，其分布地域大致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西起豫西山区，东达豫东平原，北至洹水流域，南抵大别山北麓，方圆500余公里。裴李岗文化发现前后，在河北省武安县又发现了磁山文化[4]，还有陕西省华县的老官台文化[5]，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6]，内蒙古兴隆洼文化[7]，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下层文化[8]，长江中游的城北溪文化和浙江北部的河姆渡文化[9]等。据^{14}C测定数据，这些文化的年代虽不一致，但十分接近，大致都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些遗存发现的初期，称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晚段[10]，此后随着广西、广东、江西等地一批年代更早

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与确定，又将其定位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11]，但是有的学者仍坚持裴李岗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12]。还有的仍将其划入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3]。这说明目前裴李岗文化的历史框架定位还不是完全一致。但总的说来，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距学界认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尚有约 2000 年的时间，所以将裴李岗文化放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仍是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对其早期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的研究是十分不利的。但根据已发现的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14}C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 7500 ~ 前 6000 年。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原始经济的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类型，遗址多是在靠山或山坡上以及水边，作为聚落形态表现为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洞穴遗址比较重要的有江西万年仙人洞[14]和吊桶环、道县玉蟾岩。万年两处遗址的上层年代在公元前 12000 ~ 前 7000 年，均发现有类似栽培水稻的植硅体。在玉蟾岩洞穴发现有水稻谷壳实物，年代为公元前 8000 多年。这些发现为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新证据[15]。广东英德青塘洞穴群[16]与广西桂林甑皮岩[17]等，其主要特点是栖息地为洞穴。洞穴中有多处火塘。生产工具石器多为打制，磨制亦占一定比例，主要器类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和斧等。骨器有箭头、鱼镖和锥，还有角器和蚌器。发现的动物骨骼以鹿类为主，次之为猪、猴、灵猫等，还有鸟类和鱼类；螺、蚌的堆积甚厚。从生产工具和动物骨骼来推测，当时的经济还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农业文明似已在局部地区显现，制陶技术还未出现。

贝丘遗址广泛分布于广东、广西沿海地区和西江两岸，主要有广东潮安石尾山，广西防城杯较山、马兰咀山[18]、南宁豹子头、扶绥江西岸和敢造、邕宁长塘和横县西津等处[19]。遗址面积小的数百平方米，大的在 1 万至 2 万平方米之间；生产工具中石器主要是蠓蛎啄和网坠，骨器多是箭头和骨锥；整个遗址布满大量的贝壳堆积，还发现有鹿类和鱼类等遗骨，说明当时的人类是以贝类为主要食物来源，辅以狩猎和捕鱼，此类遗存还不见农业的线索。

以上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应是聚落的遗存，其形态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和经济类型的制约，社会经济与文化尚处于缓慢的发展时期，聚落规模都不大，但都是群居的状态。生活是靠山吃山，近水吃水，原始农业刚刚出现。生产工具种类较少，打制与磨制并存，基本是根据狩猎与捕捞的需要而制造。“仙人洞中遗址先后发现有二十二处火塘或烧火堆，甑皮岩也有类似的遗迹。说明洞穴中的居民存在着较小的组织，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火塘不与别人共用火塘。推测这种较小的组织应是家庭性质的结合。至于整个洞穴聚落居民的社会组织可能是以氏族为基础的小型公社。贝丘遗址既与洞穴遗址发掘水平相近，规模也不很大，其居民的社会组织也应相仿。”[20]这些推断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态依赖于自然条件，规模也不太大，聚落居民似以家庭为单元，社会组织似已出现了小型的氏族公社，这应是以后氏族部落形成的初期阶段。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目前还未发现，但根据南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态的特点，推测应该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平原模式，另一种是浅山丘陵模式。之所

以将其概括为两种模式，是基于河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已奠定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新石器早期聚落遗存的特点，应依此作为重要的线索和信息来源。在平原地带最为著名的有许昌灵井、舞阳大岗、新蔡诸神庙等地。许昌灵井遗址发现于 1965 年秋，群众挖水塘时发现了文化遗物和化石，都出自“距地表下 10 米深处的灰色砂土和橘黄色砂土里”[21]。遗物包括 1353 件石制品，12 种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以细石器最具特色。品种有细石核、细石叶和丰富的刮削器。灵井遗存的时代有的称“中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还有的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绝对年代相当于距今 1 万年左右[22]。此外，在灵井以西 1.5 公里称为李井的池塘，挖出的砂土堆积物同灵井的性质接近，或可说明灵井石器时代遗存的范围可能很大，也有可能是灵井之外的又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这一时期平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聚落已有一定的分布，只是埋藏较深不易被发现。2005 年 4 月，曾对灵井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又出土石器、骨器制品 2000 多件。其中磨制石器和骨器 30 件，并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雕刻器。出土的动物化石有 20 余种。出土的动物骨骼上多有人工加工痕迹。灵井遗址也是国内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包括湖相、漫滩相（湿地）堆积物背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者认为其性质是人类狩猎、肢解动物、加工兽皮、石器、骨器的工作营地[23]。2006 年 3 ~ 12 月，再度发掘出土石器、骨器及其制品 1.2 万件，其中石制工具约 300 件，骨制工具约 700 件。出土动物化石 16 种，并在遗址西北 74 米处发现一段古河道。灵井遗址成为华北地区文化遗物和包涵信息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24]。

舞阳大岗旧石器地点，位于舞阳县侯集乡大岗村北的一处自然岗地上，岗地隆起 310 米。1989 ~ 1999 年，揭露面积 290 平方米，发现了第 3 层（裴李岗文化层）和第 4 层（细石器文化层）的地层叠压关系，显示出它在史前考古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亦说明这一地点的旧石器文化早于裴李岗文化，年代上距裴李岗文化不会太远。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聚落选址，仍注重岗坡的地形，承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选址理念。第 4 层发现石制品 327 件，类别有细石核、砸击石核、锤击石核、石片、细石叶、多种形状的刮削器、尖状器、修背石片、磨刃石片等。原报告通过与陕西渭南北阎村周原黄土剖面的对比，认为与北阎村剖面的年代相当，距今 12700 年[25]。“在华北细石器遗存中，大岗所处的时代较晚（原报告称时代较早），这为研究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目前虽不能说新石器文化从大岗文化直接过渡而来，但它毕竟让人们看到旧石器时代最晚阶段的文化面貌。”[26]大岗遗存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平原地带人类生活的另一自然环境状况。

浅山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存，在河南发现的有南召小空山，安阳小南海，西峡小洞，荥阳织机洞、蝙蝠洞等。属于秦岭山脉东延的伏牛山侵蚀、剥蚀低山丘陵地区。靠山脊处有上、下两个溶洞。下洞是小空山最大的洞穴，因位置靠下而得名。1980 年 6 月，在下洞发现石制品后进行试掘，发现 100 余件石制品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可定为石器的有 45 件，品类有砍砸器 25 件，刮削器 7 件，还有石球等。上洞遗址 1987 年发掘，出土石制品 153 件。并对下洞残留部分进行了清理，又获石制品 55 件和一批

动物化石。此次发掘，其主要收获是否定了该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认识，确定上、下洞的地质时代属更新世晚期偏晚阶段，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27]，以上两例旧石器晚期遗存，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前身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生存环境形态而言，与省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有许多共性。不同点在于南方近水地区是贝丘遗址，而北方平原上近水地区是丘岗坡地遗址。山洞遗存和丘岗坡地遗存中原始农业的线索较少见，人类生活是靠自然经济，出土的石制品证明，当时的人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从动物骨骼上有火烧痕迹分析，人们的饮食用火，不同区域或山洞或丘岗坡地都是氏族成员群居生活。在浅山区是选择自然山洞栖息，在平原则是选择可避水灾的岗丘坡地聚居。与新石器时代的选址似没有太大的差别，亦即向阳、避风、近水等为先决条件。无论是山洞还是平原就目前所知面积较小，都在 1 万平方米以下。舞阳大岗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直接叠压在旧石器晚期的地层之上，许昌灵井已出现磨制石器。所以推测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将是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的延续，保留有较多的旧石器晚期的特点。

华北地区所发现的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罐、钵类粗陶，还有石锤、石磨盘和石磨棒、骨镞、骨锥等工具，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有的可能为家畜。年代约为公元前 10000 ~ 前 8600 年，是迄今为止华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此外，阳原于家沟遗址也发现有超过万年的陶器。怀柔转年遗址除发现陶器外，同出有较多典型的细石器，年代相当于南庄头遗址[28]。这些重要发现初步显示出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概貌。推测处于华中的河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亦应是农业已经出现，已有陶器，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已有少量的家畜饲养，聚落规模大而分散。通过对旧石器晚期遗存和新石器早期遗存的观察分析，也为我们寻找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积累了经验与线索。

二、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的发展状况

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及其聚落形态，在早期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显著的特点是农业普遍发展，聚落遗址数量的增多和大型遗址亦即中心聚落的出现。这一时期聚落遗址中不论早晚，都出土有比例较大的农具，包括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另外还有石斧、石刀、石凿等其他工具。石器多为磨制，且工整细致，琢磨兼制次之，也有少量打制和琢制的细石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出土有骨制工具，制作一般比较工整。主要有针、匕、锥、镖、镞和锯、凿、镰等，它们也是当时重要的生活用具。从骨质生产工具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仍以渔猎、采集作为食物的辅助来源。中原地区较大的聚落遗址有新郑裴李岗 2. 2 万平方米，舞阳贾湖 5. 5 万平方米，新郑唐户 20 ~ 30 万平方米，河北武安磁山 8 万平方米等，小型聚落遗址则仅有千余平方米至 1 万平方米左右。如信阳南山嘴遗址，面积约 1800 平方米，新郑沙窝李近 1 万平方米。这些裴李岗文化遗址一般堆积较薄，遗物数量也不很大。这时的中心聚落的形成，是农业发展带来的结果，只有人们拥有较大量和较长时间的食物储备，才能结成较

大的氏族集团聚居在同一聚落。

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武安磁山遗址、莪沟北岗、沙窝李遗址居住区内都分布多少不一的灰坑，这些灰坑多是储存粮食的窖穴，较典型的是磁山遗址，有几百个储藏粮食的窖穴，其中发现粟壳朽灰，如换算成新鲜粮食，可达 50 吨以上[29]。贾湖遗址发掘 2000 余平方米，就有灰坑 320 座，揭露出的房基有 45 座，这里的粮食储备亦当不在少数[30]。沙窝李遗址仅揭露 850 平方米，就发现 20 个灰坑，30 座墓葬[31]，说明这时期无论是大型的中心聚落，还是小型的分散聚落都有充足或一定数量的粮食剩余和储备。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多因揭露面积所限，而难知其详细的整体布局。近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而进行考古发掘的新郑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址，虽然目前只挖了 4000 平方米，仅是遗址的一少部分，得以窥见聚落内部布局之一斑。已发现的房屋基址，共有 47 座，均为半地穴式，平面有椭圆形、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数种，门向有南向、西南向、东南向。其共有特点是朝向向阳低洼的一面，以求得向阳背风。房子以单间为主，共 44 座。双间房有 3 座。6 座房内有灶。在Ⅳ区西南部居住区内还发现有排水系统。发掘表明，这些居址可分为四组独立的单元，中间被生土隔离。第一组位于第Ⅲ区西北部，有房基 2 座，因邻河，其他房基有可能被冲毁。第二组有房基 12 座，位于Ⅲ区的东北部，与Ⅱ区的东南部相连，略呈带状环绕分布在上述壕沟内侧，该组居于坡状地貌上。第三组位于Ⅱ区东南部与西部，共计 6 座，本区房基面积已经出现大小悬殊的差别。如 F16 不到 5 平方米，而 F7 达 20 平方米。在区域内还发现人工沟 1 条，疑为排水之用。第四组有房基 27 座，位于第Ⅲ区的东南部和Ⅳ区的西南部，房址分布较有规律，从北向南大致分为三排。门多朝向西南，个别朝向东南的房屋被朝向西南的房屋打破，说明这些建筑也有毁后再建的过程，而且再建时房屋朝向理念发生了改变。在整个发掘区内共发现灰坑 160 座，仅在此区内就有 120 座之多，所以房屋周围分布有密集的灰坑亦即窖穴遗存。在此区还出现有双门道和阶梯式门道的房址，而且在门两侧各有一座窖穴，形成独立的生活单元。发掘者认为：“房址形式结构的新变化以及按照一定规律成排分布的特点，说明此组房屋在建筑技术及布局形态上更加成熟，此区当为裴李岗文化聚落的核心区域。”[32]

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聚落遗址，发掘 2000 余平方米，清理房址 45 座，平面形状以椭圆形为主，另外还有圆形、不规则形、方形或近方形和马鞍形。结构以半地穴式为主。房内有的无灶，有的有灶。类型有单间式，占 37 座；多间式，房址 5 座。多间式又可分为双间式、三间式、四间式三种。另外，还有干阑式 2 座。平地起建式 1 座。房址的分布规律，亦受揭露面积的局限，统一观察分析较为困难。但总的说来，在多组房址中，房址面积的大小和分间的多少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其分组而居的布局已经形成。大体可看出二房址 1 组、三房址 1 组、四房址 1 组不等，有的还可以从大的布局上连接成排。多处房屋都有二次扩建的迹象。大的房址面积可以达到 40 平方米，也有小房址围绕大房址的现象。在每组房址的周围分布着大量的灰坑，有些还有供人上下的台阶，虽然都是储藏性质的窖穴[33]。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墓葬区，与居址相邻，有的或混杂其间。新郑裴李岗遗址，墓葬集中在遗址的西部，居址在东部。共清理 116 座。分三组群：西组群分布 35 座，偏东侧有 M54 较大；中组群有墓葬 48 座，偏东侧有 M38 较大；东组群有墓葬 31 座，偏南部中间 M27 较大。方向以南向为主[34]。

舞阳贾湖墓葬区在遗址中分布多处。中区墓葬在南部，其中以 M486 为大。西北区墓葬大量集中在西北部，其中以 M277、M366、M887 较大，由于过于集中，墓之间打破关系严重，所以 3 座大墓应有先后关系。东南部也有少量分布，其中以 M397 为大，墓葬与居址混杂在一起。西区墓葬主要集中在东部，其中以 M106 为大。西南区墓葬也集中在东部，墓葬方向以西向为主，次之为西南向，少量为西北向，都在 230°～320°之间[35]。

这些墓葬分布有序，排列规律，方向多趋一致，墓葬大小多较平均，仅裴李岗每组群中有大墓 1 座。贾湖西北区有 3 座，M277、M366、M287 有多层次的打破关系，这 3 座较大的墓当属不同的时段。其他区内墓葬较大的也仅为一座。墓坑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没有葬具，葬式以单人直肢为多，极少见俯身葬，个别为双人葬和三人葬，死者多为一次葬，二次葬者甚少。随葬品以陶质生活用具为主，石质生产工具次之，装饰品甚少，这些随葬品是人们生产、生活用器状况的反映。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烧陶技术的应用和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当时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和聚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裴李岗遗址和贾湖遗址中都发现有陶窑，说明各聚落遗址的陶生活用器都是就地生产的。这时的陶器都是手制，火候尚不甚高。陶色以红陶为主，褐色陶次之，灰陶最少。陶质均匀细腻，陶土似经过淘洗。夹砂陶掺有砂粒，有的有蚌粉或炭粒。陶器的器表多为素面，仅是夹砂陶器上饰有篦点纹、篦划纹、指甲纹和乳钉纹。晚期的陶器上开始饰少量的绳纹和彩绘纹。陶器的器型主要有小口双耳壶、三足壶、敞口钵、三足钵、深腹罐、平底碗、杯和鼎等，成为裴李岗文化颇具特色的陶器群，也是人们能吃到足够的熟食，促进消化，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健康的必备器皿。

裴李岗文化聚落的选址，主要以嵩山为中心，分布在浅山丘陵区和黄淮平原西部的过渡地带，仅有极少数的遗址在真正的平原上。由此而形成浅山丘陵地域特征和平原过渡地域特征。前者是丘陵台地，或盆地边沿或谷地上，一般距水源较远，取水从岗脊下至谷底，近者数十米，远者达千米左右。在这种区域内，还有些聚落分布在河谷的一或二级阶地上。有的在两河交汇的台地上，由于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和取水的不便，制约着旱地农业的发展，所以一般聚落面积不大，都在 1 万平方米左右，有的甚至仅有数百平方米至数千平方米。一般地层堆积较薄，地表遗物少见。属于台地聚落遗址的有新郑裴李岗、新密莪沟北岗[36]、马良沟[37]等，属于河旁阶地的遗址有新密张湾、青石河[38]、登封王城岗[39]、巩义铁生沟[40]、郏县水泉[41]等。平原过渡地域特征，聚落分布在河流和湖泊附近，遗址位于河旁或两河交汇处，地形属于平原上的坡状地或岗丘地，有的为阶地形式，聚落面积相对较山区扩大，并出现了较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面积从数万平方米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面积小的仅有数百平方米。大型聚落的出现证明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农作，

粮食增多，亦可获得渔猎之利加以补充。促使氏族集团迅速扩大，属于平原地带的聚落有新郑唐户、舞阳贾湖、漯河翟庄[42]、长葛石固[43]、中牟业王[44]、郑州宋庄[45]等。新郑唐户、舞阳贾湖大型中心聚落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已步入昌盛期的重要标志。这些遗址多有别于浅山丘陵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有些遗址从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成开始，世代繁衍，劳动生息，绵延数千年而不间断。有些遗址虽有断代现象，后来又有不同期的文化在这里延续。所以，这类遗址文化堆积较厚，文化内涵也极为丰富。如唐户遗址不仅有裴李岗文化，而且还有仰韶文化[46]、龙山文化、新砦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及汉文化等[47]，其文化堆积可达 1.5～4 米不等，并多处都有不同文化层上下叠压的现象。

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气候条件也非常有利于农耕生产和人类居住生活。许多资料一致证明在全新世中期距今 80000～25000 年前是全新世的高温期，当时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很多。“在距今七千多年以前，华北这一带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 2℃～3℃,或更高一些。距今 8000 年左右可能是全新世以后，冰后期最温暖的时期。”[48]气候也是当时农业发展、聚落增多与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结　　语

本文概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的形成，以及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变化，对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态的探索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众多平原旧石器晚期遗存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长期以来人类是从山洞走向平原的这一基本概念。最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存聚居形态已形成浅山丘岭的山洞模式和平原近水源的岗坡模式，中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亦当依此为基础去探寻。文中对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特点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探讨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发展较快，聚落形态不断扩大，并出现了中心聚落，是因气候适宜农作，生产工具更为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发展机遇，并成为聚落形态、社会形态发展的原动力。在中原地区又因地理环境和经济类型的不同，又存在着不同的形态，即浅山丘陵地区与平原或平原过渡地带的差异。农业分粟作和稻、粟混作型。但他们又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都能基本满足生产、生活必要的物质需求，诸如住所、劳动生产工具（先进的磨制石器）、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皿以及粮食储备等。这一时期，作为聚落形态仍是内向、封闭的凝聚型。人们相互依存，从而形成一个牢固的集体，这种集体的社会形态就是“氏族”。氏族是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它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社会制度。裴李岗文化众多聚落遗址群的发现，说明当时的中原地区已经生活着众多的氏族部落。从裴李岗文化墓地中的墓葬分布和住址分布情况看，在当时的氏族内部，可能已经进一步分化成若干小的氏族组群。虽然同在一个聚落内，住址是分组出现的，死后同用公共墓地，埋葬是分不同的组群，每个组群中有个别大墓，似显示着墓主人与其他成员身份的差别。“这种小的亲族集团又称作女儿氏族或母系大家族，它们和氏族的性质大体相似，也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集体，

它是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殖，氏族内部的事务逐渐复杂起来，为组织生产和安排生活的方便，从而进一步分化为小的集体。女儿氏族还保留在母亲氏族之内，但已自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成员们生前生活在一起，死后也葬于小集体的墓地。”[49]这一论述比较精辟地概括了裴李岗文化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并结合发现的其他种种迹象，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氏族社会确已进入昌盛时代。

注　　释

[1]　赵世纲：《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 年 2 期。

[2]　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9 年 3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 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 1 期。

[4]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 年 6 期。

[5]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 年 3 期。

[6]　吴汝祚：《北辛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 10 期。

[8]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 1 期。

[9]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 1 期。

② 河姆渡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 5 期。

[10]　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 年 1 期。

[11][20]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12]　① 蔡凤书、宋百川：《考古学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② 孙英民、李友谋：《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3]　杨育彬、袁广阔：《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4]　① 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 年 1 期。

②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 年 12 期。

[15][28]　任式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 年 9 期。

[1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 年 11 期。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 年 3 期。

[18]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 年 12 期。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丘遗址》，《考古》1975 年 5 期。

［21］ 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 年 2 期。
［22］［26］ 杨育彬、袁广阔：《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
［23］ 李占杨：《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年报》17 页，2005 年。
［24］ 李占杨：《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年报》21 页，2006 年。
［25］ 张居中、李占杨：《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6 年 2 期。
［27］ 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7 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 年 2 期。
［29］ 佟伟华：《磁山遗址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 年 1 期。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 年。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 年 12 期。
［32］ 张松林、信应君等：《新郑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大面积居址》，《中国文物报》2007 年 7 月 13 日。
［33］［3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 年。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 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 1 期。
［36］ ① 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 5 期。
②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1 年。
［37］ 开封地区文管会、密县文管会：《密县马良沟遗址调查试掘》，《考古》1981 年 3 期。
［38］ 魏殿臣、谷洛群：《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 年 3 期。
［3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
［40］ 开封地区文管会、巩县文管会：《河南巩县铁生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0 年 5 期。
［41］ 郏县文化馆：《河南郏县水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9 年 6 期。
［42］ 赵世纲：《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
［4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1 期。
［44］ 开封地区文管会：《河南省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 年 3 期。
［45］ 郑州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郑州文物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4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2005 年 5 期。
［47］ 开封地区文管会、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新郑县文管会：《河南省新郑县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 年。
［48］ 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的遗址》，《动物骨骼考古学报》1981 年 3 期。
［49］ 郑杰祥：《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夏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

（原载《论裴李岗文化——纪念裴李岗文化发现 30 周年暨学术研讨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与蔡强合著）

颛顼时代传承脉络与氏族文化关系

本文依据各种文献以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分布情况，对颛顼的生地、世系传承、与其他氏族的联盟、联姻关系，故都所在，以及与周围的氏族文化关系、族属等，都一一作了探讨。认为颛顼的父族是在北汝河一带，其母族在该境北部西平出山地区。他继承了黄帝文化，成为中原盟主。庙底沟二期是颛顼族的主体文化，但与东夷族关系密切，濮阳高城遗址是史载颛顼故都，也是黄帝族与东夷族相融合的产物。河南周边龙山文化的其他类型的早期，则是颛顼支族和东夷、蚩尤、苗蛮文化的传流。

颛顼是五帝之一。在远古时代，是氏族集团的领袖，因代代相传，又成为氏族集团的代称。《春秋命历序》说："颛顼传九世，共三百五十年。"颛顼为黄帝之孙，直接继承炎黄氏族之大统，与该族曾居于领袖地位，成为中原盟主，之后其主体又繁衍发展成为有虞氏族和夏后氏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里仅就颛顼时代的形成、传承脉络（与所处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与周边氏族的文化关系、故都所在等加以研究，从而证明这一时代并非虚构，而是历史之真实。

颛顼祖黄帝，其氏族的发展，通常采用联盟、联姻和融合的方式，一代代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融合其他氏族而壮大。其生平始末，据《五帝本纪》载：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颛顼作为德才兼备的继承人。"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修黄帝之道而赏之，弗或损益而治平。"[1]颛顼时代承炎黄文化之遗续，将炎黄文化发扬光大，社会稳定和谐，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颛顼。"这里也说颛顼的祖族是黄帝，父族是昌意。"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鼓叟，鼓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些都表明颛顼氏族繁衍出了众多的子族，子族又代代相因。既都是氏族的分支，又可称为后裔，较重要的是颛顼成为有虞氏王朝鼻祖和夏后氏王朝鼻祖之祖族，传承了华夏氏族之根脉。《礼记·祭法》也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注曰："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这是说古人祭天配祭祖宗，在南郊，筑有圆形的祭坛。古人对宇宙的认识，为天圆地方，所以祭天在南郊，用圆形的祭坛。祭地在北郊用方形祭坛。祭祖宗在明堂，即宗庙之殿堂。颛顼是五帝之一，有虞氏、夏后氏都将颛顼列入"祖祭"的对象。《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蜀山氏之谓昌濮氏，产颛顼。"西陵氏之

女嫘祖为黄帝正妃。西陵氏族起兴之地，当在今西平县董桥一带，今有仰韶文化遗址存在，笔者曾亲历调查，并有专题报告[2]。通过调查认为：“董桥遗址中的仰韶早期文化当与炎黄时代西陵氏族嫘姓古国有关，西陵氏族的兴起亦当在炎黄时代的初期。”“如果从历史学、考古学角度去分析，来认识西平董桥的地理位置，考古学文化定位与历史文献记载，西陵氏族兴起于西平则是较为可信的。”[3]西平县距新郑百余公里，西陵氏作为黄帝的通婚族，两族联姻融合使黄帝族发展壮大起来。昌意族又与蜀山氏及其子族昌濮氏成为通婚族，此两族又成为颛顼族的先祖集团。颛顼氏族集团应该是在这两个氏族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邹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邹人者，郑氏也（笔者按：邹人者，妘姓，春秋初为郑武公所灭，并占有其地，故而称郑氏）。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4]自颛顼始，代代通婚族的增多，壮大了颛顼氏族集团，联合了滕氏及女禄氏，竭水氏及鬼方氏，分支出了老童、重黎及吴回，陆终与鬼方氏通婚，又分出六个支子族。从原生氏族到分化出的别支，有近 20 个之多，并都成为诸侯国。还有文献说祝融也是颛顼集团的亲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此二条文献矛盾而无法对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祝融是颛顼的亲族，属于一系脉传，认识确是一致的。《国语·郑语》说：“黎为高辛氏火正，故命之为祝融……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注曰：八姓即“已、董、彭、禿、妘、曹、斟、芈也”。这八姓据许顺湛先生研究，其“族人后来散居地域，除了南到两湖交界处和东到山东西部外，主要集中在大中原地区”[5]。据《新郑县志》说：“然六子（陆终六子）之世，子孙有国，数千年间，迭为伯王。”颛顼之后，确是子族繁衍，人丁兴旺，并都成为不同的诸侯国。

鬼方在殷、周时是西北部族名，地当在岐周以西，陇之间。《竹书纪年》说：武丁（商王）“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克鬼方”。强大的商王朝历时三年才打败鬼方，说明鬼方部落实力雄厚而强悍。据王国维考证：“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陇，环中国（指中原地区）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华夏甚远……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6]鬼方氏族起源甚早，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存在。活动区域其早期可能在今豫北、冀南一带，依托太行山区，到商周时期，不断迁徙，到了我国西北陇地区。也就是说，颛顼氏族联姻已达到中原边沿地区。氏族的联合与发展，显示出颛顼集团所具有的核心作用和凝聚力。宋罗泌把颛顼的后裔汇总为 125 个小国，其中有 92 个小国还能约指其地，说明这一氏族集团确已形成庞大家国之雏形。

远古时代氏族联姻的作用，应该是利于人类种族的繁衍，融合外族，增进互信，减